

中国海军 抗日战史

苏小东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海军 抗日战史

苏小东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郑牧野
封面设计：马淑玲
版式设计：严淑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海军抗日战史 / 苏小东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

ISBN 978-7-01-017698-7

I. ①中… II. ①苏… III. ①海军—抗日战争史—中国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8060 号

中国海军抗日战史

ZHONGGUO HAIJUN KANGRI ZHANSHI

苏小东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36

字数：463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7698-7 定价：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内容简介

中国海军抗日作战是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力、表现及影响，深刻地昭示了中国这个濒海大国之命运中海军、海防、海权的意义。本书以大量原始档案为依据，并配以珍贵的历史图片，首次完整地再现了中国海军抗战的全貌，即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海军的最初反应，到全面抗战期间中国海军以阻塞作战、防空作战、布雷作战等作战样式所展开的海口封锁和内河抗战，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参与受降、收复台湾及南海诸岛，既还原了广大海军官兵浴血奋战的事迹，也揭示了中国海军在日军大举侵华时望洋兴叹、退入内河被动防御的教训。通过全方位多角度地透视中华民国海军在内战中的建设与运用，客观评估其海军战略取向的内外错位，进而反思海防与海权的本质区别。

海軍抗戰事蹟

忠勇壯烈

不惜犧牲

陳銘寬



自序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场长达14年的反侵略战争中，先有“九一八事变”后的局部抗战，后有“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既有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敌后战场，也有国民党政府指挥的正面战场。在正面战场上，海军抗战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实力、表现及影响，深刻地昭示了中国这个濒海大国之命运中海军、海防、海权的意义。

我最初研究中国海军抗战，只是将其作为计划撰写的中华民国海军史的一部分，时间是在20多年前。

按照传统的治史方法，著述任何类别的通史或专史，两项前期准备都是必不可少的，一是汇集尽可能完整的史料长编，二是进行阶段性专题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陆续撰写了几篇有关民国海军的文章，其中就包括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一文。撰写此文的初衷，就是试图确定中国海军抗战的基调，惟当时依据的资料并不全面，立论的基础未免有些单薄。三年后，我将初步完成的中华民国海军大事记和史料长编整合为《中华民国海军史事日志（1912.1—1949.9）》，于1999年10月由九州图书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肯定，以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史著称的台湾学者王家俭教授还撰写了长篇书评推介于海峡两岸；

但同时也有学者和读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该书的不足之处，即记述海军抗战的内容太少以致该部分多有留白。对此，我既无法否认，也深感愧疚。其实在作史料长编时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所掌握的民国海军史料颇有欠缺，而海军抗战的第一手资料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才造成书中这一部分的明显塌陷。既知尚未充分占有史料，且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在这方面难有预期之进展，因此计划撰写的民国海军史也就迟迟未敢下笔。

从一定意义上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史料。只有充分占有史料，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进一步地研究及认知方有其学术价值。民国历史虽然在时间上相去不远，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很多专题研究在史料的搜集上反而困难重重，民国海军史尤为突出。诚然，任何研究历史的人都不可能穷尽其研究领域的所有史料，但如果明知有重要的史料存在，而无论何种原因尚未一窥究竟时，便言之凿凿地信笔论史，其实不过是有意识无意的戏说而已。就民国海军史料而言，揆其要者有三：一是民国海军的档案资料，二是民国海军编印的月报、年报、公报、统计、图表、战史、沿革史、大事记等文献及各种海军刊物，三是民国海军亲历者的回忆录或口述历史。我最早接触到的民国海军史料是后两部分。民国海军实时编印的各种文献及刊物，不仅种类多，印数亦非独一，故比较容易入手，惟经历较长的动荡岁月后要想查阅齐全亦相当困难，或几乎是不可能的。民国海军亲历者的回忆或笔述或口述，都是对官方档案记载的重要补充，尤其在历史细节上独具特色。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组织一批老海军人员成立研究委员会，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即联系民国海军亲历者就某一具体问题撰写回忆，并据此于1960年7月开始编辑《中国近代海军史参考资料》，但可惜只编印一辑就中断了，惟有已收到的数十篇回忆手稿作为资料留存下来。此外，在全国及省市政协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中，也收录了数量众多

的民国海军亲历者的回忆文章，而且很容易查找。台湾地区也有亲历者陆续发表回忆录，尤其是张力等学者访问记录之海军人物口述历史，既有个人专集，也有多人合集。总的来看，民国海军亲历者笔述、口述之回忆普遍欠缺准确性和客观性，故须考订之后方能确定取舍。最具史料价值的当然是原始档案，即使其中或有不实之处，亦属其本来面目。存档文件大多都是独一份，其史料价值自有不可替代性，惟其集中收藏于档案部门，查阅起来多有不便。收藏民国档案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将所藏民国海军文件均归入第 787 号全宗，但严格说来其内容并不属于民国海军档案，因为南京政府海军总部存档已于 1949 年被全部运到了台湾。台湾地区研究海军史的学者虽有查档之便利，但真正用之于研究则晚至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而且多为仅就某一专题使用部分相关档案撰写论文。涉及中国海军抗战而相对集中完整者，当属台湾“海军总司令部”于 1994 年 1 月出版的柳永琦所编《海军抗日战史》，分上下两大册共 2806 页。该书虽在编排上杂乱无章，论述部分亦错误颇多，但难得的是该书收录了海军抗战的主要档案资料，而且是以档案原件影印后收录其中。因此，将该书作为海军抗战史料汇编，才是其最大价值所在。由于该书并非公开出版，印数又很少，当我看到时已是差不多十年之后了。在我撰写《中国海军抗日战史》这本书行文过半之际，台湾“海军司令部”又编辑出版了《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海军抗战期间作战经过汇编（1937—1945）》，其中“重要史料”及附录“舰艇作战报告”部分收录之档案影印件数量虽远不及前述《海军抗日战史》，所收录者又多与前书重复，惟其影印清晰而更易辨识，且有少量首次公开的档案。上述两书的参照互补，大致能够体现出海军抗战档案资料的全貌，评述中国海军抗战也终于具备了核心要件。

评述中国海军抗战，主体当然是中国海军，所以我才特别注重中国海军抗日作战史料的收集。同时我亦深知，目光仅限于中国海军抗战，

并不能看清其真实样貌，还必须将视野扩及当时国内国际的方方面面，尤其需要深入了解敌对一方的日本及其海军。就此而言，这本《中国海军抗日战史》或有未尽之处，在此恳请识者不吝赐教。其实，即便是只将中国海军抗战史料收集完整，凭我一己之力也很难实现，因此我要特别感谢为我提供重要史料的美国夏威夷大学荣休教授马幼垣先生，也感谢及时惠予新编史料的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馆长吴登峰女士。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给予我支持帮助的朋友还有许多，在此不便一一致谢，我将铭记在心。

2015年12月

拙著《中国海军抗日战史》自脱稿后，历时一年有余，终于可以付梓了。2017年适逢以日军挑起“七七事变”为标志的中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正可将此书作为一种特殊的纪念，既是纪念中国海军广大官兵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的民族精神，更是纪念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海军望洋兴叹、退入内河被动防御日军侵略的惨痛经历，以为今日之鉴。

2017年5月

目 录

自 序	1
导 言 伤心问东亚海权	1
一、北洋政府时期的海军	4
二、南京政府十年的海军	15
第一章 战争序幕中的海军	26
一、日本的海权利剑	26
二、魂断松花江	33
三、潮起黄浦江	52
四、声讨海军风波	57
五、海军部长数度请辞	73
六、海军实力与作战预案	100
第二章 长江下游阻塞战	110
一、日本海军直逼长江口	110

二、长江航道锁江阴	122
三、海军与淞沪会战	142
四、海军的“九二三之役”	165
五、江阴保卫战	193
六、第3舰队撤离青岛	205
第三章 长江中游攻防战	219
一、战时海军编制	219
二、长江中游的攻防部署	236
三、海军与武汉会战	254
四、遭遇空中猎杀的舰艇	276
五、“中山”舰喋血金口	292
六、海军洞庭区炮队撤退案	309
第四章 东南沿海防卫作战	324
一、浙东江防之战	324
二、锁不住的厦门海口	333
三、闽口阻塞与防战	344
四、从虎门到西江	360
五、粤桂江防之战	375

第五章 坚持抗战到底的布雷战	388
一、相持阶段的日伪海军合流	388
二、组建海军布雷队	410
三、长江上游布雷战	430
四、敌后布雷游击战	451
五、海军陆战队之陆战	462
六、戏剧家与海军宿将的对话	470
七、战争结束前的海军整建	487
尾 声 海军受降与收复海疆	496
一、大陆各区海军受降与接收	496
二、台澎地区海军受降与接收	512
三、收复南海诸岛	526
四、接收日本赔偿舰艇	544
参考文献	557

导 言

伤心问东亚海权

尽力民国最多，缔造艰难，回首思南都俦侣；
屈指将才有几，老成凋谢，伤心问东亚海权。

这是孙中山为追悼中华民国首任海军总长（南京临时政府）、海军总司令（北京临时政府）黄钟瑛而写的挽联。1912年12月28日，黄钟瑛追悼大会在上海湖南会馆举行，孙中山亲临致哀并送挽联，表达他对其4个月南京临时政府之海军总长“老成凋谢”的痛惜。惟其挽联最后一句“伤心问东亚海权”，实已超出对黄钟瑛个人的悼念。这一有感而发的时代浩叹，既饱含对既往中国有海无防的悲愤，也充满了对现实中国依然不能问津东亚海权的忧虑。

数年之后，有一位名叫姚伯麟的医学界人士编著《战后太平洋问题》一书，阐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日在太平洋竞争之态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他在自序中说：“或有问予曰，欧战后尚有第二大战发现乎？予不能答，亦不敢武断，予但见太平洋波浪兼天涌、美日风云接地阴而已。”^① 孙

^① 姚伯麟（1877—1953），字鑫振，陕西三原县人，1915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科，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从事医务和医学教育工作。姚虽然终身不仕，但关心国事，除著有《战后太平洋问题》，抗战期间还发表过《文信国公正气歌释义》一文，1948年3月出版的《抗战诗史》录诗作约千首，时有“民族诗人”之誉。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姚曾任上海文史馆馆员。

中山谓姚著此书“以唤起国人之迷梦，俾国人知所远虑，以免近忧焉。其救国之苦心，良足多也，故喜而为之序”，时在1919年9月。孙中山在序言中直叩太平洋问题之本质：“何为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由地中海而移于大西洋，今后则由大西洋而移于太平洋矣。昔时之地中海问题、大西洋问题，我可付诸不知不问也；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运命者也。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谁握此门户，则有此堂奥，有此宝藏也。人方以我为争，我岂能付之不知不问乎？”^① 又是海权，而且从东亚扩展到了太平洋，但遗憾的是除了伤心而知却仍不可问。

海权的核心要素是海上力量，海上力量的主体是海军，但由此却不能逆向推导出有海军即有海权。晚清中国自海上门户被西方列强敲开之后，曾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掀起一场洋务运动，亦即在捍卫和巩固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学习、运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器物来实现富国强兵。洋务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建成了亚洲首屈一指的北洋舰队，目的则是为了加强海防，甚至企图以此重新关上国门。与此同时，中国的近邻日本虽然面对几乎同样的遭遇，却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以海外扩张为最高国策。结果，当日本挥舞“海权”利剑终于挑起侵华战争时，大清北洋海军防不胜防，直至覆灭于军港之中，海防亦随之崩溃。不同的战略选择决定了不同的命运，甲午战争用血与火诠释了海权与海防的本质区别及其决定性影响。从此，日本在东亚海权格局中得以坐大，而再次陷入有海无防境地的中国则在新一轮东亚海权竞争中加速沉沦。另一方面，甲午战争也使中国社会精英开始觉醒，认识到传统“中体”之下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于是转

^①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9页。

而要求制度现代化,也便有了战后不久的变法与革命。孙中山即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其组织发动下,革命的星星之火经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终成燎原之势。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被拥为临时大总统。然而,孙中山在位仅4个月即解职了,又8个月后又发出了“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感叹。

创立近代海权理论的美国海军上校马汉(Alfred T. Mahan)将影响海权的主要因素归结为六个方面,即地理位置、天然地形(包括天然物产与气候)、领土面积、人口数量、民族性格与政府的性质。^①其中前三项属于天然条件,后三项则是民族文化与观念的产物,因而具有可塑性。但就海权的外向性而言,海权以及支撑海权之海军的塑造还必须具备一个基本前提,即国家政权的统一和稳定,以便有可能形成对外的战略取向。当一个国家处于以暴力争夺或维系政权的状态中,海权问题就绝不可能成为追求国家利益的战略需求,海军则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内战工具。1911年的辛亥革命,如同一道闪电,将龙椅上的皇帝击落在地,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戛然而终。然而,闪电过后,根深蒂固的专制独裁思想并没有随之瞬间消除,反而趁机崛起的军阀势力大行其或争夺中央政权或割据一方之道,由此形成社会失序的局面。由于国家的实效统治断裂,本应支撑海权的海军建设失去政治、经济保障,只能被挤压在内战中维持生存,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换言之,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海军的战略追求和现代化建设不但没有出现新的转机,反因长期成为内战工具而日益退化,以致完全丧失了抵御外敌海上入侵的能力。

^① [美]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李少彦等译,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一、北洋政府时期的海军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定北京为首都。袁乃北洋军阀领袖，而在其后掌控北京政府者亦为北洋军阀，故民国后的北京政府又有北洋政府之谓。

中国历史就这样进入到民国时代，中国海军在体制上亦随之呈现出民国新面貌。1912年1月1日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即曾设有海军部，以黄钟瑛为海军总长，汤芑铭为次长。随着孙中山的解职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取消，南京的海军部迁至北京，重组北京临时政府海军部。3月30日，北京临时政府第一届（唐绍仪）内阁成立，海军部为内阁所设10部之一，刘冠雄为海军总长。31日海军部正式成立后，又在上海设立直隶于海军部的海军总司令处，以原南京临时政府海军总长黄钟瑛为海军总司令（黄钟瑛于1912年12月4日病逝后由李鼎新接任）。海军总司令处下辖左、右两舰队，后分别改称为第1、第2舰队。同时，经袁世凯核准和参议院议决，定五色旗为国旗，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另设海军总长旗、海军次长旗、海军上将旗、海军中将旗、海军少将旗、海军代将旗、舰首旗、前任旗、当值旗、海军长旒等，于8月1日正式悬挂。中华民国海军就这样登台亮相了。

在新的民国海军组织架构下，海军实力并没有任何变化，所有舰艇均属清朝遗物。其中直接转为民国海军的有：1895年服役的英制鱼雷炮舰“飞霆”（349吨）、德制鱼雷炮舰“飞鹰”（850吨）及鱼雷艇“辰”“宿”（均为90吨）、“列”“张”（均为62吨），1897—1898年服役的英制巡洋舰“海圻”（4300吨）和德制巡洋舰“海容”“海筹”“海琛”（均为2950吨），1901—1902年服役的国产驱逐舰“建威”“建安”（均为870吨），1906—1908年服役的日制浅水炮舰“江元”“江亨”“江利”“江贞”（均为525吨）、“楚泰”“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谦”（均为740吨）及鱼

雷艇“湖鹏”“湖鹗”“湖鹰”“湖隼”（均为96吨），1911年服役的国产炮舰“联鲸”（500吨）和德国青岛造船厂制造的炮舰“舞凤”（220吨），另有1895年服役的国产练习舰“通济”（1900吨，原名“建靖”）。此外，1909—1910年，清政府筹办海军大臣载洵、萨镇冰在意、奥、德、英、美、日等国以分期付款方式共订购12艘新舰。这批舰只陆续建成时，清王朝已垮台，新生的民国政府因无力交付后续船款，最后以高息债券和国库券为抵押只接收了其中9艘，即在英国订造的练习巡洋舰“肇和”（2750吨）、“应瑞”（2460吨），在德国订造的驱逐舰“豫章”“建康”“同安”（均为390吨）和浅水炮舰“江犀”“江鯤”（均为140吨），在日本订造的炮舰“永丰”“永翔”（均为780吨）。上述舰艇，适于出海者被编入第1舰队，即“海圻”“海容”“海筹”“海琛”“飞鹰”“飞霆”“永丰”“永翔”“联鲸”“舞凤”“豫章”“建康”“同安”等；适于内河者编入第2舰队，即“建威”“建安”“江元”“江亨”“江利”“江贞”“楚泰”“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谦”“江犀”“江鯤”“湖鹏”“湖鹗”“湖鹰”“湖隼”“辰”“宿”“列”“张”等；1913年7月另组练习舰队，编入“肇和”“应瑞”“通济”3舰。

新生的中华民国海军实力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微不足道，既不足以捍御漫长的海疆，更遑论追求海权。1912年底，海军部向国务院呈送《各国海军现势比较表》，其中以舰艇数量和质量为主要依据排列各国海军名次，中国弱至第16位。^①出于军种使命和军种利益，海军部于次年（1913年）3月拟出《海军第一次制舰计划案》密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并请交付国务院议核。海军总长刘冠雄首先说明：世界各国有陆国、有海国、有陆海交错之国，陆国偏重陆军，海国偏重海军，陆海交错之国则陆军与海军并

^① 北京临时政府海军部制：《各国海军现势比较表》（1912年12月31日），殷梦霞、李强选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第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461—464页。